

流散中的定位^①

——刍议华裔美国作家文化译者身份及其汉译

杨 琦,周文革

(湖南科技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南 湘潭 411201)

摘 要: 结合流散写作的特点,从华裔美国作家的特殊文化身份和写作特点入手,借用后殖民主义翻译观的诸多视角,主要探讨了华裔流散作家在双重文化语境下的特殊译者身份、在文化翻译中对“中国形象”误读、改写的不可避免性,以及随之而来的东方主义倾向,同时也聚焦中国译者所面临的种种尴尬。

关键词: 华裔美国文学;流散写作;翻译;文化译者;东方主义

中图分类号: H0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117X(2011)01-0144-05

Self-identity in Diaspora: On Chinese American Writers' Identity of Cultural Translators

YANG Qi, ZHOU Wenge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Xiangtan 411201,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diasporic writers, special cultural background and writing styles and on several different perspectives of post-colonial translation theory, this paper discusses Chinese American writers' special identity of cultural translator under the double cultural context, the unavowed rewriting of "Chinese image" during cultural translation and also its potential of "orientalism". What's more, it also focuses on the embarrassing situations of Chinese translators.

Key words: Chinese American literature; diasporic writing; translation; cultural translator; Orientalism

进入全球化时代,当大量移民从中心向边缘地带快速流动的同时,也出现了从边缘向中心地带缓慢推进的趋势,这种双向的大规模的移民潮导致了民族文化身份界限的日益模糊,流散现象也愈来愈引人注目。这种现象导致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流散写作的方兴未艾,作者民族和文化身份的认同等问题的研究也随之而来。^[1] 纵观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奖者,其中首次出现了墨西哥、南非、圣卢西亚、葡萄牙、匈牙利、奥地利、土耳其的作家。他们的出现及作品丰富着主流,也消解

着主流与边缘的界限,因此西方学者很早就将目光投向了这些备受诺贝尔文学奖青睐的流散作家。近年来,许多以海外华人为主的创作群体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移民和侨民文学创作群体,尤其是美国华裔文学在近20年得到中美学术界广泛关注,并且他们在明显的全球意识但又难舍难离的东方文化背景下抒写文学作品更是被称为“流散写作”,成为“流散研究”的新鲜素材。但究其研究主题也只是集中在美国华裔文学的特殊诗学话语和文化身份追寻、中华文化意识、当地本土文化意识的碰撞和

^① 收稿日期:2010-10-12

基金项目:2010年湖南省研究生创新科研课题(CX2010B390)

作者简介:杨 琦(1984-),女,陕西宝鸡人,湖南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翻译理论与实践研究。

融合,以及女性主义等方面。在2009年的美国华裔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王宁、乐黛云和孙艺峰等几位教授学者渐出新意,谈到要将流散文学与翻译结合起来,并认为翻译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文化问题,一种深刻文化内涵的转达是传统的翻译研究无法解决的,但总体来说,在大多数学者就华裔美国文学研究殊途同归的今天,将这些华裔美国流散作家作为文化译者身份的问题很少有学者予以关注。那么怎样理解华裔流散作家在双重文化语境下的特殊译者身份,对“中国文化”的异样阐释或是改写是否有理可依。是该认同原作者的流散身份还是将其归入本土,是改写原文中变异了的“中国”情节还是忠于原作。被西方人认为的他者在回归本土的语境下能否找到归宿,即是再现他者的本土形象还是又一次将其消声等系列问题,是本文将要讨论的内容。

一 流散现象与流散文学

流散(Diaspora)原是希腊词,又可译作“离散”、“流离失所”,最早指的是犹太人亡国后,被迫流亡世界各地,颠沛流离的惨状。^[2]如今这一术语本身带有的种族歧视意味已随着近十多年文化研究中的频繁使用而逐渐淡化,主要泛指因一定原因外部的或散在的生活分布,与某种文化中心的疏离,边缘化的处境、状态和人群。对流散这一课题的研究并不算新鲜,但其作为一种文学现象的“流散写作”研究则始于90年代初的后殖民研究。其主要代表为后殖民主义理论批评大师爱德华·赛义德、斯皮瓦克和霍米·巴巴,同时许多学者将目光聚焦于大名显赫的西方作家,乔伊斯、福克纳、海明威、贝克特等及他们的作品,他们以色调浓重的口吻,处处诉说着其身处物欲横流,种族差别的异国,一颗破碎历经磨难的心都在试图寻找曾经的归宿。如今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伴随流散现象而来的新的移民热日益加剧,一大批离开故土流落异乡的作家或文人不自觉的借助文学这一媒介来表达其身居异国的经历和寻根亦难的情感。这些人的作品中既充满了游子对故土的眷恋,又表达了融入他国文化过程的艰辛和无奈,同时又不乏令人神往的异国风情。由于他们的写作是介于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民族文化之间,因而既可与本土文化进行对话,同时又以其“另类”特征而跻身世界文学大潮中。之于

本土,他们往往有着自己独特的视角,从一个局外人的眼光来观察本土的文化;而之于全球,他们的写作又带有挥之不去的鲜明的民族特征。^[3]正是这种特殊的身份使得其文学作品具有明显的流散性,且使得流散研究及其产生的流散写作和文学研究又一次成为全球化时代的后殖民和文化研究的热门话题。既然流散文学都是出自于移民作家之手,很多人会质疑流散文学是不是等同于移民文学?其实不然,流散文学远不是移民文学这样简单化的称呼所能概括的,它体现了本土与异国之间的一种文化张力:相互对抗又相互渗透,从而体现了全球化时代的一种独特的文学现象。^[4]即流散远远超越了简单移民意义上的身体移位,而是蕴藏着旅居的无奈亦或是身处世界主流的优越感,流散文学更是一种对文化身份认同的诉说和诠释。

汤婷婷、谭恩美常被西方文坛提到的改革开放后移民去美国的哈金、虹影、裘小龙等的流散写作向美国文学经典的重构发起了挑战,不仅引起了主流文学研究者的瞩目,也成为流散文学研究的主要对象。王宁教授主张把这些以自己双重民族和文化身份创作的华裔流散文学推向美国社会大众的功臣称为华裔流散作家。在他们的作品中我们可以发现其流散写作的双重特征,为了在主流社会或异国的众生喧哗之中发出自己独特的声音,他们依靠自己的双重身份和文化背景,一方面通过大量再现中国文化或改写中国童话而颠覆了以往被西方人误解的中国民众的形象,或再现华人群体因主体性丧失而不能被异己的西方文化所接受的夹缝状态;另一方面也因接受中国文化的间接性而享有身处第一世界的优越感,从一种第三者的角度对本民族的弱点进行深刻批判。然而也正是由于西式的教育,老一辈口语相传的辛酸或传奇的故事,作家特有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再加之西方读者的“期许”等等这些复杂的身份和矛盾的处境造就了华裔流散写作,也引起了中外诸多学者的关注。

二 两次翻译,两位译者

纵观在美国文学界占有一席之地的华裔作家,无论是早期成名的黄玉雪,后来居上并迅速进入主流学界的汤婷婷,以其独特的题材异军突起的谭恩美和桀骜不驯、不断发出不同声音的赵建秀,还是近几年内成名并迅速地同时得到广大读者和学界

认可的哈金,抑或是首位获推理小说最高荣誉的华人裘小龙,都经历过如此的心理矛盾:美国这片成为他们生命中游牧放逐的土地并没有割断他们华裔的文化与黄色的皮肤所联系的民族深情,可正是这种本民族文化根基的难以动摇使他们很难与自己所定居的国家或文化相融合,经营文字中的故国之梦就成了这些华裔作家的最爱。澳大利亚华裔作家欧阳昱在一首诗中写的“英语怎么可能这么透明,甚至无法遮盖我那中国皮肤的身份……一个语言怎么可能这么无法摧毁,在被变成另一种语言的同时还能保存自己”绝不是标榜英语,而是对其混杂身份的切身体会。于是越来越多的文学批评家纷纷撰写文章为其处在边缘的混杂身份寻找合适的定位,从开始简单的“第三者”“异族”“文化边缘人”“香蕉人”到后来用“流散作家”这一更具全球化视角的概念,都在阐释着华裔作家的特殊身份。但这些比较文学出身的学者无形中都忽视了其文化译者的特殊身份。

萨尔曼·拉什迪在他的论文集《想象的家园》中将族裔散居者的迁徙同翻译联系起来,认为在拉丁文里,“翻译”的意思是“携带过去”,“既然生来横跨两地,那我们就是翻译的人。”^[5]霍米·巴巴也认为翻译“携带着家园与归属的含义,穿越中间过道……和文化差异,将民族的想象共同体联结起来。”^[6]这意味着华裔作家“混杂性”的文化身份其中永远离不开的中国情结使他们的文学创作不仅传递了语言在传递主体情感方面的匮乏,也使得翻译成为他们生存并且在寄主文化中维系自己文化身份的一种方式。然而这种翻译不是两种语言的转化,而是文化的移植与传递。正如雅各布森所言:“各种形式的理解、解释、重复、阐释和评论,只要是涉及改写或替换,就都是翻译。”^[7]“翻译”本身就暗示着“重新表达”,或者说是“重新创造”,在形式上和实用上隐含于每一个沟通的行动中及每一个意义的传达与接受的模式中。若将其投射到华裔美国作家的文学创作中,与其说他们是在通过带有中国元素的英文写作构建主体,不如说是构建着对异域文化的再现。华裔在美国的边缘地带使得他们极力想用写作证明其在主流社会的地位,中美文化的差异和距离成为契机,华裔美国作家将有关中国的历史事件、神话故事,通过自己的阐释将西方读者不熟悉的中国文化元素翻译成了他们能看

懂的英文版。在不考虑其文化翻译是否忠实并假设其对中国传统只褒不贬的前提下,我们可以肯定这些流散华裔作家已不是孤独的文人,而是在美国多元文化的舞台上展现华夏文明的炫丽舞者。

当然,当全球化的风浪又将这些席卷全美的华裔作品引回中国文化的根源地时,中国的译者(后文均简称中译者)又肩负起了流散作家巨著的故国之旅。这比起广义上的文化翻译,中译者不仅要还原被借出去的中国元素,甚至是包括可能被变形改造的意象,使两种文化在第二个译本中完美结合,还要克服自身对母语文化历史的一知半解,以及本土意识形态或政治立场的严重冲击。可以说他们帮同根人圆梦的同时,也是自身的一种反思。

三 两次误译的动机与深思

在认识到华裔流散作家的“文化译者”身份的同时,我们深思这些“中国印象”是否忠实?在改写、误读的背后隐藏着怎样的动机?我们同样好奇中译者在将其译作再度翻译回中国时,是如何处理不忠实的信息,又是如何在身为译者和身为中国人的道德之间斡旋的?是再度误译还是还其本源,是再塑他者还是为其正名?

汤婷婷的早期作品《女勇士》中大家所熟知的古代花木兰替父从军的故事竟然与岳母在岳飞身上刺字“精忠报国”的故事捏在了一起,从军的动机不再是忠君、爱国、孝亲,而是报复私仇及抗议男性社会之不公,孟姜女、关公等历史人物命运也发生了变异。可以说,还有很多华裔美国作家都是通过改写中国文化中的历史、神话和文学名著来表达自己的思想的。另外,从谭恩美作品中谈到的中国女性童养媳的经历和描写的唐代的一位食客食谱当中蝎子、蟑螂、虫子、鼻涕虫、甲虫、青蛙等连中国人都少见的饮食文化中,我们看到中国的形象已经烙上了原始、怪异、野蛮、残忍的印记。

类似争议颇多的篡改、误读,若只凭这些流散作家自己的解释——“避免机械的继承传统或是防止神话没有用处就会被遗忘”,是不可能做到的。笔者试据其“文化译者”身份从翻译的角度探究其改写的动机与无奈。

华裔流散作家的文学创造在很大程度上是广义上的翻译,而“译”本身就意味着“诠释”、“阐释”,由于文化的差异性使得翻译的这种阐释有多

种因素组成,其中最有意义的是译者对外国语言和文化知识以及它们与本土文化价值的关系。本雅明在其《翻译的译者的任务》一文中曾指出,在翻译中不但译文是不完整的,就连原文都不完整,这样原文与译文就都成为了纯语言的一部分,双方的关系式相为补充。^[8]移民或华裔后代的离散经历使得这些华裔美国作家都只能通过家人的口述或一些有关中国文化历史的英译书来了解其故国,也就是说他们所根据的“原本”或“素材”已经不那么“原”、“素”了,因此,他们作品中传述的异域文化总是有偏颇的,是有所改动的,补充了译语的某种特质。事实上,也只有异域文化不再是天书般地怪异,而是能够在鲜明的本土形式里得到理解时,交流的目的才能达到。^[9]抛开我们的爱国情结暂且不谈,中国博大精深的历史在西方读者眼中神秘地贴上了他们对中国或是整个东方野蛮、刻板落后、非理性、及严重的男尊女卑的封建传统等印象的标签。由于其流散身份,为了在主流社会求得生存,在主流文学中站稳脚跟,华裔美国作家只能采取白人能够接受的方式,用他们的话语来讲述东方文化。同时,从比利时裔美籍翻译理论家 Andre Lefevere 的“改写”论我们也可以找到为他们辩护的依据。Lefevere 打破以原文为标准的评价翻译的惯性思维,认为社会意识形态、诗学观、还有赞助人等诸多的语言外因素,就像一只“看不见的手”始终操纵着翻译的全过程。华裔流散作家毕竟不可能像培训同声议员那样“清空”自身,他们带着先前获知的不完整的“民族记忆”,在其边缘政治地位、想要融入美国主流社会的强烈愿望、赞助人以及西方读者对东方文化的畸形期许等系列因素的影响下,一边做着传播中国文化的大使,一边又无可奈何地为迎合美国读者对“中国印象”的怀旧情绪进行改译。笔者在此不是为其改译中国文化辩护,但更不敢苟同许多学者所评论的“华裔作家一看到洋人就缺钙”的诸多过激说法。就像旋转中的轮子一样,只有当轴心固定时,辐条和轮圈的运动才能有规则,笔者只是提议可以从翻译的角度重新审视这些处在夹缝状态中的华裔流散作家,为他们寻找一个轴心、一个支点。

当在美国畅销的华裔作品被翻译成中文时,这些变了形的内容使得熟悉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国读者的期待视野受到严重冲击,本应得到同样受益的

巨著却在其文化的发源地受到了冷落。很多历史或传说中的人物出国转了一圈回来就变了模样,这些被华裔美国作家陌生化了的“中国文化”使本土的中国读者很难辨认。这就给中译者提出了很多问题:忠实原作的改写则可能面临着失去大批的中国读者群,但按照本土陈规还原被异化的事物则会背上篡改原作的骂名;即使原文中没有改写成分,故事发生的不同背景或者本土政治环境也会对翻译产生很大的影响。例如谭恩美 *Saving Fish from Drowning* 的中文版《沉默之鱼》由于开始在内地的销量不理想,经蔡骏的改写,使这本书的首印量高达85 000册。虽然再译本中出现多处改写、编写,但谭恩美对此表示理解的态度足以让我们感受到译者在读者期待和出版商等诸多因素影响下对译本改写的无奈。此外,中国新一代移民推理小说家裘小龙的“陈探长”系列小说已在国内翻了三本,到第四本的时候出现了问题。故事发生在上海,其意大利和法文版将其直译成“Shanghai”,就唯独中文版已成了H市,包括其中很多能让人联想到上海的地名和街道名都在中文版中被改掉了。原来是这部小说里涉及到了贪官、腐败的问题,而在中国这样一个政治意识形态占主导地位的环境下,翻译的忠实性不得不让位于改写。

既然两位译者在翻译中面对同样的尴尬——对中国文化或中国元素时都不得不做出一定程度上的改写,那么笔者不禁发问,究竟谁才应该对“真实中国”拥有解释权?在经济文化全球化的多元世界里翻译时应该以谁的“中国印象”为标准,怎样的译者才能算是完美?

四 难免的东方主义倾向

萨义德在其后殖民主义理论中,论述了存在的中西文化差异导致了中西语际转换中存在着权利问题,西方对东方长期以来的主宰、重构和话语权力的压迫方式形成了“东方主义”,即进一步呈现历史和物质角度下西方对东方的霸权式想象,那么华裔流散作家鉴于其边缘混杂的文化身份,应该通过翻译“中国文化”揭露西方理性社会对东方非理性认知方式无知、片面、肤浅的想象,但事实并非如此。仔细阅读汤婷婷的作品,我们会发现许多她个人想象编造的故事,虽然她自己声称这是一种误读,但并不知情的西方读者依据其华裔的身份认定

这部作品就是中国社会的真实再现,他们绝不会费时费力去辨别其真伪。^[10]尤其是在某些西方人翻译的东方文化译本已经被视作“典律”的时候,即使许多华裔作家运用了含而不露的对抗叙事的策略以期在某种程度上用荒诞离奇的方式来纠正所谓的“东方主义”,但其中所显示出来的“地位上的优越性”都只是更加强化了中国这一“他者”形象。更具讽刺意味的是,与其说这些作品是美国读者对东方人的共同凝视,不如说是华裔作家在西方语境下对自我的凝视。可见翻译中会不免构建西方对于东方的刻板印象和偏见,所以作为文化译者的华裔美国作家在翻译中借用中国元素塑造自我身份时应该尽量避免自我殖民的倾向,做一个中国文化的传播大使,而不是所谓的兜售或贩卖。

与此同时,这就意味着中文译者肩上的担子更重,面对某种程度上已被妖魔化的中国形象,在“他者”带着没能正音的无奈回归时,中译者在对这些变异的文化回译时,又该有何作为呢?若将华裔美国作家当作同胞来对待,我们就很难阐释其篡改中国文化的事实;若将其变异的中国情结完璧归赵,就会背上不忠实的罪名;若是遵循原作者的本意,他者将又一次被消音。这一系列的问题都让我们不禁感叹中译者的难处,也深刻体会到华裔作家流散写作的无奈。

相比族裔文学坚守自己母国文化的一成不变,流散研究所提供的全球化语境使我们从一个更新颖更全面的角度来审视华裔美国作家的文学创作。澳大利亚华裔作家卡斯特罗认为写作就是一种翻译,一件伟大的想象活动,不仅是在翻译别的世界,而且也是在翻译自己跟这个世界的关系。同样经历的华裔美国作家也是在跨越边界与流散写作中

体现出难舍的“中国情结”或者他们心理错位后寻求文化归属的一种努力。只有对两种文化同等的尊重才能使华裔作家找到心灵的归属。同时,对有机会为自己“他者”形象平反的中国译者,在面对可能被改的面目全非的华裔流散作品,在忠实与背叛、认同原作与迎合本国读者的艰难抉择之间,更应该冷静客观,要在恪守翻译伦理的前提下成全这些华裔流散作家的故国之旅。

参考文献:

- [1] 王 宁. 流散文学与文化身份认同[J]. 社会科学, 2006(11):170-176.
- [2] 李果正. 刍议流散写作中的文化身份[J]. 南昌大学学报, 2004(3):105-106.
- [3] 王 宁. 文化翻译与经典诠释[M]. 北京:中华书局, 2006:79.
- [4] 朱安博. 文化的批判与历史的重构——《耻》的流散文学解读[J]. 外语研究, 2007(5):89-92.
- [5] Salman Rushdie. *Imaginary Homelands: Essays and Criticism* 1981-1991[M]. Granta Books, 1991:17.
- [6] Homi Bhabha. "DissemiNation: Time, Narrative, and the Margins of the Modern Nation", in *Nation and Narration*, ed[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0.:291.
- [7] 王光林. 翻译与华裔作家文化身份的塑造[J]. 外国文学评论, 2002(4):148-156.
- [8] Walter Benjamin. *The Task of the Translator*[M]. Arendt, Illumination, Penguin, 1991:4.
- [9] 许宝强,袁 伟. 语言与翻译的政治[M].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0:359-360.
- [10] 何绍斌. 作为文学“改写”形式的翻译——Andre Lefevere[J]. 翻译思想研究, 2005(5):66-71.

责任编辑:李 珂